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维权 与参政活动的背景和影响

杨帆

(巢湖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19世纪的英国,在女权主义思想感染下,面对妇女无权的社会现实,中产阶级妇女自我意识逐步觉醒,并广泛参与到当时的女权运动中。她们的维权和参政活动改善了妇女自身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重塑了妇女在资本主义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定位,建构了妇女自我意识觉醒发展的新内涵,并由此推动了英国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女权运动;维权与参政活动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4-0076-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4.012

The Backgrounds and Influence of Middle-class Women's Rights Mov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in Britain

YANG Fan

(College of Tourist Management, Chaohu College, Chaohu 238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witnessed the awakening of middle-class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t thoughts, and they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and fought for women's rights. The rights mov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mproved their life and image, reconstructed their role in the public fields of capitalism, created a new concept of the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ed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Britain.

Key Words: Britain in the 19th century; middle-class women; feminist movement; right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尽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促进了历史发展,但在以往的历史记载中却很少提及女性。马克思说:“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1]认识妇女史是理解以往历史的一把

钥匙。

在英国,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进步,中产阶级财富急剧上升,中产阶级妇女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受“两分领域”社会观念影响,她们退守家中,成为“家庭天使”“花园皇后”;另一方面,作为中产阶级客厅中的知识女性,她们大多受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BSS021);安徽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013gxxk086)

作者简介:杨帆(1985—),女,安徽巢湖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历史文化与旅游研究。

过教育,文化素养高,对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了解和体会较深,她们渴望自由。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花园皇后”般幽禁的生活产生了矛盾,她们渴望打破家庭的桎梏,追求自由独立。比起以往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她们的彷徨和斗争是英国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新现象。在学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微观史学的兴起,推动了对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妇女状况的研究。李·霍尔库姆(Lee Holcombe)^{[2]98}、帕特里斯·赫尼斯(Patricia Hollis)^[3]、詹里特·玛瑞(Janet Murray)^[4]、玛丽·林顿·莎莉(Mary Lyndon Shanley)^[5]、卡瑟林·格雷德(Kathryn Glead-
le)^[6]、菲利帕·莱文(Philippa Levine)^[7]等学者详细搜集了时人的日记、信件、传记、账本、文学作品、遗嘱资料等,对这一时期英国妇女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婚姻与家庭生活进行了探讨。在国内,王晓焰^[8]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角度论述了18—19世纪英国妇女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以及妇女的抗争;王萍^{[9]5}论述了19—20世纪英国妇女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她们开始利用“家庭天使”形象的积极因素,逐渐在社会各领域中发挥作用,并努力创造了“新女性”形象;陆伟芳^{[10]3}、潘迎华^[11]、周真真^[12]、李宝芳^[13]研究了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选举权运动、经济活动、慈善公益活动以及中产阶级的家庭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19世纪初英国妇女无权的社会现实与中产阶级妇女觉醒的自我意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论证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维权与参政活动的时代背景,并进一步探究其维权与参政活动的影响,这对于从微观层面理解19世纪英国历史和客观认识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文化建构所起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从表面上看是个信奉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只是以男人的附庸身份生存于世。诸多法律条文也对妇女做出了许多

限制性规定,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大不相同,妇女的有些活动甚至与法律条文极其抵触。就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例,在市镇,她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格成为公民,与男子一样从事手工业生产,可以当学徒学手艺,学徒期满便可成为工匠,成绩优异者还可带徒弟当师傅。“直到1772年,伦敦的自治城市法仍允许妇女在城市中独自从事买卖和生产。”^{[14]2}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中产阶级妇女,还可以参加行会组织,当行会的成立发起人。“18世纪钟匠行会的记录表明,吸收年轻女学徒成为会员,并非不寻常。”^[15]

18—19世纪,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家庭手工劳动,生产日益社会化,然而妇女的地位并未与经济同步发展。相反,妻子从前或许是丈夫的帮手,协助丈夫从事生产劳动,而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家庭和工作场所分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分离,中产阶级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是两性在其中发挥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作用的场所了。相反,中产阶级男子在给妇女套上“家庭天使”的光环后,又以“女子在外部世界的完全无能为力,在家庭中绝对驯服温顺”的新标准来衡量女性,并以此来规范私人领域中女性角色行为。男尊女卑的家庭观念占据上风,过去没有引起太多重视的有关妇女限制性规定和法律现在被恪守不渝,中产阶级也开始动真格地管教起他们的妇女。现实生活中,在跨进由工业革命带来的欣欣向荣的19世纪时,英国妇女便丧失了在法律、经济和家庭生活中的一切权利。

妇女虽有“家庭天使”的桂冠,但在法律上,她又是根本不存在的。女性在未成年时,便受到父亲或者男性亲属的管束。而女子一旦结婚,便失去了法律地位,更丧失了所有的权利。“19世纪有关妇女和家庭的观念是:在法律和习惯上,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法律不承认已婚妇女有独立于丈夫之外的人格和身份。”^{[10]20}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英格兰法律述评》中还说:“妇女一旦结婚就要失去法律的存在。夫妇属于同一个法人,这个法人就是丈夫。已婚妇女不准管教子女,也不准

管理自己的财产。”^[16]已婚妇女的真实存在以及她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暂时终止了,或者说至少融合到丈夫身上,妻子已经是丈夫所有物中的一部分,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所有的妻子都完全服从丈夫,他可以任意剥夺她的所有。”^[17]在夫妻关系中,妻子的身体也是属于丈夫的,没有法律许可,便没有拒绝性生活的自由,更谈不上离婚自主权。

在财产上,作为女儿,她即便是土地和财产的继承人,也受其男性亲属的管束和财产监护;作为妻子,她拥有的一切财产归丈夫所有,连自身也是丈夫的动产之一。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妇女要动用她的财产,必须得到未婚夫或丈夫的首肯。

没有工作权利的妇女独立生活非常辛苦。即使有些妇女已经外出工作,社会也对这一现象持批判态度。1859年,英国《星期六概览》就记载:“妇女的职业就是婚姻生活;她从生下来所有的训练就是为了依靠丈夫而活。当然,如果她找不到丈夫,或者失去了丈夫,这就证明她的‘职业生涯’以失败告终,她从此便会无依无靠。……在英国,按照习惯法,不能教给妇女有用的艺术,这只能害了她……而我们不需要这样不男不女的女性。”^[18]今天普遍成为妇女职业的一些工种如医生、文秘、会计等,当时大多为男性垄断。虽然习惯上认为男性亲属会给予中上层妇女经济上的支持,但实际生活中,有些丈夫将自己收入用于个人消费,却不给妻子必要的生活费。有例为证:“1863年起,有一个丈夫把所有的收入用于个人消费,却没有给妻子必要的生活费,妻子不能找到工作,因为她丈夫已有一份体面的收入,于是她便饿死了。”^[18]

家庭生活中,没有法律保障的妇女苦不堪言。中产阶级妇女从小开始就为结婚作准备,但当结婚时却无权选择配偶,等到婚后,又没有属于自己的钱财,也无权使用丈夫存款,面对可能受到的来自丈夫的残酷的心理和生理伤害也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她们只是一种无声无形的男性附属品。恰如密尔所说:“没有一个奴隶

会像妻子那样是如此纯粹意义上的奴隶。”^{[9]95}

总之,到了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惊讶地发现,她们的地位表面上提高了,居住宽敞,穿着优雅,生活安逸,悠闲自在,可实际上地位却在下降,从丈夫事业上的左右手,变成纯粹的摆设与花瓶,丧失一切社会经济功能,放弃了对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10]8}。现实生活中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已经难以忍受,时任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的莉迪亚·贝克尔(Lydia Becker)深有感触地说:“贵族妇女或工厂女工是独立的人——个体,中产阶级妇女则什么也不是。”^[19]

二

在“家庭天使”光环下,法律上不存在的妇女被幽禁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要想挣脱束缚,就必须唤醒妇女自我意识,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人,由她们自己来决定命运。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在近代思想家有关女权主义思想的启蒙影响下,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思想和激进运动的感染下,在追求自身独立过程中成长起来。

人的解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强调人的解放,宣扬理性精神。妇女运动先驱者受到感染,纷纷呼吁女权。17世纪,最先呼吁女权的是玛丽·阿斯泰尔(Mary Astell),她指出男女拥有同等的理性能力,理应获得同等教育,女性要成立自己的社区,过一种摆脱男人的生活。到18世纪晚期,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女权辩护》中系统阐述了女权主义思想,主张“妇女应该涉足公众生活,在精神上独立,反对无所事事、过分强调感知的贵族妇女,对女性进行理性教育,令其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成为更值得尊敬的社会成员”^[20]。密尔则从更深刻的哲学角度论述了妇女自由平等的权利。他在《政治经济学》和《论自由》中强烈呼吁妇女法人代表权、财产权、工作权、教育权和婚姻自由权。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强烈谴责社会给予妇女的不平等地位,着重分析了妇女受

奴役的社会和历史因素,认为:“真正的人类美德应该是,他们作为平等的人共同生活;除了自己能不求回报地给予别人东西,不为自己向他人提出任何要求。”^{[9]102}当时的法国思想家傅立叶也大胆宣布:“某一历史时代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21]社会主义者理查森(R·J·Richardson)在《妇女权利》中说到妇女的政治参与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对社会的责任。这些女权主义思想在启发中产阶级妇女自我意识方面的作用不可估量。

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不仅受到当时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广泛参与19世纪激进改革和社会活动,获得了最初的政治参与经验。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和她们的女儿都成为了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积极分子,如莉迪尔·贝克尔(Ledia Becker)和巴巴拉·利·史密斯(Barbara Leigh Smith)。如果说中产阶级妇女参与各种激进运动是追随男子在运动中充当配角的话,那么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在为全体女性争取婚姻生活权利、工作权、受教育权和财产权斗争中,则充当着主角。

受到女权主义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中产阶级妇女的心智得到了启发;而广泛参与19世纪的激进运动,则使她们积累了许多政治斗争的经验,于是中产阶级妇女们逐渐奋起抗争,争取自身权益。

同时,19世纪英国逐渐以国家干预的思想取代自由放任,使得政府工作不再局限于军事、外交,而开始向济贫、公共卫生、教育等部门扩展。传统观念认为教育子女和济贫工作尤其适合女性。出于对女性参与这些工作的需要,英国政府让妇女参政,帮助解决19世纪严峻的社会问题,中产阶级妇女成了资产阶级实现社会改革的帮手。

此外,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也将她们的目光从封闭的家庭带到了广阔的社会大舞台,社会的无限广阔性和妇女个人生活的相对狭隘性的差距对中产阶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促使她们去思考,追求自身处境

的改变,于是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自我意识迅速地成长起来。不少中产阶级妇女已经发出觉醒的呼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卡桑德拉》中呼唤:“自由——自由啊,神圣的自由,你最终会来吗?”^{[14]67}女作家夏洛特·勃郎蒂(Charlotte Bronte)在《简·爱》中写道:“我不是天使,我今生今世都不想成为天使,我就是我自己。”^[22]中产阶级妇女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体会深刻,她们不愿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率先勇敢地冲出家庭的藩篱,追求独立平等。她们知道脚下并非一条平坦之路,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大步向前。

三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逐渐意识到女性长期被压迫的原因,围绕着选举权、参政权、法律公民权、受教育权展开了艰辛的、富有成效的维权斗争,自我意识逐步觉醒发展和成熟。从妇女对公正的要求,到妇女本质论的提出,至妇女对平等的要求,妇女自我意识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和发展升华,并与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紧密结合,对英国妇女自身解放影响深远,并为英国民主化进程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对英国妇女的影响。首先,觉醒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将女权思想理论付诸维权和参政实践,在史无前例的英国女权运动中,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权利。部分中产阶级妇女在地方政府和专门委员会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参政热情,压迫妇女的法律被逐渐修正,妇女有了离婚权、孩子的监护权和财产权,还有了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胜任诸多工作。原先依附于男子的中产阶级妇女获得了应有的权利,逐渐摆脱了任人摆布的历史命运。其次,相比较18世纪后期,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随着女权斗争的深入,中产阶级妇女获得了地方选举权利,有的妇女还当选为教区和市镇代表,有的甚至当上市长;政府行政部门也聘请了许多女教育委员、女济贫委员和工厂女视察员,这些无疑是她们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再次,中产阶级妇女的

斗争也影响了各阶层妇女,她们带动了工人阶级妇女和上层贵族妇女投身政治的热情。共同目标和相似的生活际遇使得她们在斗争中长期磨合,最终形成了女性性别阶级,并在 20 世纪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中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

权利的获得意味着她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位女士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这些变化欣喜地评论:“我们的祖母忙于刺绣和研究菜谱的时光早已过去;我们的单亲姑妈宁死也不愿做任何有失教养之事的年代也在迅速消逝;现在年轻的姑娘,对女性智慧和妇女工作的见解与日俱增,她们正站在渴望融汇人生冲突新生活入口处。”^{[2]194}走出家门的中产阶级妇女再也不是受人蔑视和自哀自怜的对象,她们成了令人尊重和自尊自爱的新女性,成为更加开放和自由的个体。这些变化背后包含着难以道尽的辛勤付出,蕴藏着难以掩饰的喜悦。

(2)对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首先,中产阶级妇女活跃于政治中使得男女“两分领域”的观念受到冲击,人们对妇女活动于公共领域的态度有所转变。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新秩序,工业革命的既得利益集团——中产阶级男子用“两分领域”的家庭观来约束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们,认为妇女是家中的天使,必须珍惜、管理和纯洁家庭,这样的观念是以女性在家庭外世界中完全无能、在家庭中全部驯服为特征,反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认为她们健康的身体会受到损害,吃不消学习压力,将不能履行女性职责,更反对她们外出从事繁重的工作。而随着中产阶级妇女斗争的深入和部分权利的获得,她们在教师、护士等职业以及政府部门中的杰出表现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肯定。女性应守在家中的传统观念受到女权运动者的抨击,民众也越来越认可妇女的权利和她们在地方政府事务中的杰出贡献。以巩固意识形态为目的而创造的女性天使形象显然与 19 世纪中后期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19 世纪末,自信、能力、健康、女性美于一体的新女性逐渐被人们接受,男子也从最初的愤怒转向妥协于女性的新变化。

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的财富不均衡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不平等控制。“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国家,逐渐控制了原本为公共服务的媒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向国家社会一体化。”^[23]这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加上妇女的奋斗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妇女们的政治参与也潜移默化地消弭了性别界限,瓦解了所谓领域截然分野的传统观念。到 19 世纪末,随着中产阶级妇女的斗争,她们已经拥有了部分有限的权利,活跃于公共领域,重新建构了中产阶级妇女在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力,也表明了英国社会的文明开化逐日增长。

其次,英国中产阶级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推动了英国民主化进程,其维权运动也是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是以中上层妇女为主体,由其倡导和参与,主张在不触动现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为妇女争取与男子相等的政治参与权,进而改善和提高妇女地位。19 世纪妇女选举权运动以及中产阶级妇女在地方行政事务中的参与表明了妇女解放的初始。当然,妇女的解放包括着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社会风俗和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变革的漫长过程。19 世纪英国妇女的选举权运动本身就具有开创性,对英国民主化进程也产生了影响。当越来越多的人享受越多的权利,民主化的程度就越高;同样,越多的妇女享受越多的权利本身就可以表明民主化的程度。正如约翰·哈罗德·克拉潘(John Harold Clapham)所说:“妇女的法律地位最能表明文明程度。”^{[14]87}中产阶级妇女也间或地与争取普选权的男子合作,来表明她们的政治热情。19 世纪中产阶级妇女参与选举权运动是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又是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妇女权利的获得亦为英国民主化程度的一根标尺。

再次,中产阶级妇女的维权活动客观上推动了英国教育体制和法律体制的健全。中产阶级妇女变革现有法律的斗争推动了法律体制的健全,1839 年,《儿童监护法》颁布,规定了妇女

拥有18世纪的法律中所没有的监护权。1857年,《婚姻诉讼法》获得通过,规定了妇女享有离婚权和部分财产权;《已婚妇女财产法》生效,进一步完善了妇女财产权。妇女已经获权成为法律上的民事主体,由19世纪初法律中“丈夫的私有财产”变成独立的人,这无疑标志着法律中有关女性权利的制度完善。关于女性权利的完善和提高也符合法律制度的民主化和平权化发展方向。

中产阶级妇女改革女子教育的活动推动了教育体制的健全,争取平等受教育权的努力使女子教育有质的飞跃。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而是为了让女性能更广泛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教育内容开始向男子学校的教学内容靠拢,更注重文化和技能教育。公共教育制度开始建立,义务教育着手普及,所有阶层女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诚然,女子教育从传统迈向现代充满艰辛,但19世纪中产阶级妇女无疑是女子教育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总之,中产阶级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实践是19世纪英国妇女社会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影响深远。对全体妇女来说,它意味着权利的获得、地位的提高和全新的精神面貌;对英国历史发展来说,中产阶级妇女维权和参政活动冲击了不平等的“两分领域”家庭观,推动了民主化进程,促进了法律体系和教育体制的健全。从长远看,随着女权思想的深入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妻子外出就业行为的常态化,直接推动了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共同养育孩子、共同发展社会关系的“共同夫妻角色关系”的婚姻生活与家庭模式的形成,而这也会进一步丰富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1.
- [2] Lee Holcombe. Victorian ladies at work, middle-class working women in England and Wales 1850—1914[M]. New York: Hamden House,1973.
- [3] Patricia Hollis. Women in public 1850—1900[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1:7.
- [4] Murray Janet Horowitz. Strong-minded women: and other lost voices from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M].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84:4.
- [5] Mary Lyndon Shanley. Feminism, marriage, and the law in Victorian England, 1850—1895 [M]. London: I. B, Tauris&Co Ltd Publishers,1989:50.
- [6] Kathryn Gleadle. Borderline citizens: women, gender,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Britain 1815—1867[M]. Oxford: Oxford U. P,2009:11.
- [7] Philippa Levine. Feminist lives in Victorian England: private roles and public commitment [M]. Los Angeles: Figueroa Press,2003:8.
- [8] 王晓焰. 18—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5—60.
- [9] 王萍. 现代英国社会中的妇女形象[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10] 陆伟芳.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1] 潘迎华.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投资经营活动及其原因分析[J]. 世界历史,2013, 6(6):32—43.
- [12] 周真真. 维多利亚前期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慈善活动[J]. 理论界,2010(5):105—106.
- [13] 李宝芳,马世力.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文化探析[J]. 深圳大学学报,2008,25(2):8—13.
- [14] 马嫒. 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M].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15] Snell K D M. 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 social change and agrarian in England 1600—19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273.

- [16] 奚广庆,王瑾.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9.
- [17] Wingerden S A Van.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Britain [M]. New York: Macmillan,1999:6.
- [18] Judith Worsnop. A reevaluation of "the problem of surplus women in 19th-century England: the case of the 1851 census" [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1990,13(1/2):21-31.
- [19] Martin Pugh. Women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Britain[M]. London: Macmillan Press,2000:3.
- [20]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王瑛,译.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6:4.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49-250.
- [22] 夏洛特·勃郎蒂.简·爱[M].萧柠,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315.
- [23] 哈贝马斯·J.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梁光严,译.社会学研究,1999,3(3):35-36.

(责任编辑:夏玉玲)

(上接第 23 页)李大钊是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1936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道:“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11]

1949 年 3 月 25 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不胜感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 年了! 30 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参考文献:

- [1] 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35-36.
- [2] 金炳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890.
- [3] 范平,叶笃初.党的建设辞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9-60.
- [4]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7.
- [5]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6.
- [6] 《史学概论》编写组.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77.
- [7] 朱乔森,李玲玉,柳建辉.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389.
- [8] 李景田.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921-201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 [9]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55-56.
- [10] “双百”评选活动组委会.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8-99.
- [1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12.

(责任编辑:李亚平)